

主持人语

钱林森

2009年10月，商务印书馆推出周宁教授的新作《人间草木》。这本书写了四组人物：马礼逊和柏格理、苏曼殊和李叔同、托尔斯泰和马克斯·韦伯、梁济和王国维。第一组人物是传教士，第二组是出家人，第三组是现代知识分子，第四组人物是传统儒者。这四组人物代表着四种人生境界或人生问题：第一组人物生活在纯粹的信仰中，世界清明，没有疑惑；他们在爱与正义的激情中谦卑不懈地努力，并从中获得宁静幸福。第二组人物经历过生命的焦虑与恐惧，分别走向人生的审美与信仰的境界，审美者执著生死，在令人陶醉的感性炽热中离去；信仰者觉悟，进入澄明与安宁，有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感动。第三组人物在人生中途经历“灵魂转向”，生活在现代“祛魅”后的世界里，不管是心灵强大还是头脑清晰，圣徒的激情与智者的思想同样令人痛苦。他们都意识到生命的悲剧，但选择的超越路径全然不同。第四组人物在大失败的时代里，试图以自觉的死亡拯救生命，问题是，他们究竟是勇敢还是懦弱？自杀者究竟是在担当中推卸，还是在推卸中担当？这些人都是些亲切而又高贵的人，曾经的生活充满灵性，耐人寻味也令人敬畏。他们实践的四种人生境界实际上提出了四种问题。这些问题人们意识不到的时候，可能在幻觉中感到天地分外宽广，一旦意识到，便从此局促不安……

《人间草木》的出版，引起读书界广泛的关注，《读书》、《博览群书》、《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新京报》等十余家报刊发表书评，《北京晚报》、《南方周末》、《宁波晚报》等出专版发表就该书的访谈。《人间草木》并不是大众读物，因为它讨论的问题是思想性的，而不是娱乐的。人们对该书的关注，也集中在一些严肃的问题上，诸如什么是生命的意义、学术的问题、思想的形式等。一本书的意义已经不限于书本身，它引起的思考与讨论是无限延伸的；一本书的意义也不在于它的出版，而在于它的不断再版，开始它的经典化历程。为了将此书引发的问题持续深入地讨论下去，本刊组织了笔谈，发表乐钢、丁帆、陈熾如、叶隼、贺雄飞、丛晓眉、齐宏伟、周云龙的相关文章，就《人间草木》的书写方式展开多重对话其中有对当下学术话语维度的批判，以及思想形式的反思，还有对周宁教授学术理路的测绘。

周宁教授在《人间草木》的“前言”中指出，“学术有为人生的学术，为入心的学术。为入心的学术通过历史诊断现实，为入心的学术，如果也算是学术，通过他人诊断自己。”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该书所暗示的关于“什么是学术”的问题。乐钢的《神交南迦巴瓦：周宁的北人作南人之旅》以提问的方式介入这一问题。乐钢提出的问题是，弘一法师与周宁教授相通相守的文人生命“子午线”的隐喻意义何在？对于该问题，乐钢的文章没有直接作答，而是在“祛魅/再魅”的框架（该框架同样适用于探讨周宁教授的跨文化形象学研究）中，解读周宁教授及其笔下人物之间的照应与纠结，在思想的版图上给《人间草木》和书中的人物勘定界标，进而论述处于祛魅化末端的周宁的艰难再魅之路。乐钢认为，具有症候意味的技术“走题”可能恰恰暗示着心灵的“走神”。韦伯作为《人间草木》理性层面贯穿始终的对话者，在其身上，周宁教授看到了理性与生命间难以调和的冲突。这一对话正是把握《人间草木》的创作动机及历史价值的标尺。如果依靠重建本体论去再魅化已经不可能，那么经由理性的心智而抵达心灵的家园就会成为周宁教授的必然选择。无疑，这正是一种“为入心的学术”。而周宁教授的“北人作南人之旅”既是该选择的一个现实注脚，更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它启悟读者去思考这一人生空间位移背后的实践意义。

“政治与学术的职业伦理的问题”是现代知识分子面临的一个最难解决的二难命题，也是贯穿《体悟“行动生命”与“沉思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一文的

核心问题。丁帆在这篇文章中把《人间草木》与《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并置，进行比较对读，认为周宁教授对托尔斯泰与马克斯·韦伯的灵魂的精彩剖析，已经辩证地回答了马克·里拉所谓的“戴奥尼索斯（Dionysius）式的难题”。马克·里拉在痛斥欧洲那些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不过是呆在书斋中神游叙拉古之余，期望历史学家若真想理解“知识分子的背叛”，他们要去检视的地方就是“内心世界”。《人间草木》正是从检视人的“内心世界”开始，对“沉思”与“行动”、“政治”与“学术”等思想难题做出了富于启示的个性化思考。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提炼出有核心理念，形成新思想、新理论元素产生的动能，这才是“真学问”的底色。《人间草木》异样的文体风采正是在这个层面上熠熠生辉。

陈燕如的文章认为学术的终极使命应该是揭示真理，洁净己心，进而洁净人心。从这一尺度着眼为《人间草木》进行文化定位，它其实是一部具有“反身性”，即通过剖析自身而认识他人（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的学术著作。《人间草木》区别于一般的人文知识分子写作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此。分别从心灵史、思想史和行动史读解《人间草木》中的四组人物和八种人生，内省、牺牲、执着、“成”人、克己是贯穿始终的关键词，其中含蕴着人类最高贵的美德。在“信”与“知”的漫长角力中，“知”渐具上风，但这种虚幻的确定性能否引导我们走向“正爱”呢？也许，这是当下的学术界亟待思考的问题。

齐宏伟的文章关注学术中的“生命实践”的内容，并从该视角出发重新界定学术的要义，因此，衡量学问的价值标尺就是看它是否转向了“爱”。齐宏伟认为，《人间草木》正是一部转向了“爱”的作品，并借用克尔凯廓尔的“房屋”喻说，缕述《人间草木》“化学问为‘房屋’的诸多努力”，同时也论述了周宁教授在《人间草木》中所采用的“个体化方法”。既然转向了“爱”的学术应该带有某种“生命实践”，那么其终极价值就在于引导人们从身体层面（心与脚）去践行“爱”。真正自觉的学术是与生命融为一体的，齐宏伟的文章从这一角度阐发出了《人间草木》的重大启迪意义。

《人间草木》是一本“偏离学术”的书，却在思想的轨道上。作者表白：“人生的某个阶段，尤其是到了中年，开始‘关怀自身’。反思性的自我意识突然萌醒，生活也变得真实严肃起来。通常学术在客观与公共的知识世界里，学者个人内在生活体验的内容，是不足为论的。我则想在这段时间这本书里，偏离所谓‘学术’的轨道，触碰个人心灵的内容。”书的出版，重要的不是一本书，而是一本书引起的人们对思想与思想的形式反思。作者说：“为人生的学术，旨在建构独创性的思想体系；为人心的学术，旨在建构风格化的个人经验，刻画心灵的形式。”准确地说，《人间草木》并不是学术著作，在对个人的生存体验、情感想象的感性呈现中，该书隐含着另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即什么是思想的形式？叶隽的文章从学者伦理的维面，质疑了《人间草木》对“人生”与“人心”二分论述，认为“学人之思”不能脱离“学人之知”，否则就极易致使“心灵的形式”沦为“悬空凌思”，理想的境界应是“二元归一”。叶隽借用佛教用语中的“俗谛”概念，指出摆在学人面前的真正挑战在于“如何应对俗谛”。唯有坚守学术伦理的底线，才能超越俗谛，向死而生。叶隽从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以及周宁教授的学术轨迹的角度，对《人间草木》的思想形式进行了批判，并进一步提出了何为“学人之思”的问题。贺雄飞的《挣扎于天堂与死亡之间》着力探讨《人间草木》的语言和思想的冒险。周宁教授用诗性的语言思考哲学与宗教问题，这一独特的思想形式潜在地呈现出当代人的灵魂状态和信仰的危机。同时，这一语言和思想的冒险也是作者的一次自我精神拷问和升华，在其背后彰显的乃是一位人文学者的悲悯情怀。

正如周宁教授所说，这是一本“不伦不类”的书，我突然意识到，在当今中国学术界，周宁也是个“不伦不类”的学者，他不断更换研究课题与领域，经常用诗人的想象力从事学者的思辨工作，著作多有“突发奇想”处。《人间草木》所写的四组人物，代表着现代人生自觉的四种境界或四种困境。但问题是，生命的意义或者生死大义根本就不是现代学术的问题，学术可以拒绝思考，否

则就得非学术地思考。从晓眉敏锐地指出，在以非学术的方式思考学术问题的“奇想”之外，《人间草木》的最大“奇想”还在于把托尔斯泰与马克斯·韦伯放在一起进行探讨。二者之间的潜隐关联在于，在一个祛魅后的现代世界里，什么是知识分子的生存使命？事实上，这正是周宁教授自身的问题。从托尔斯泰和韦伯身上，似乎可以辨识出寄居其中的作者面影。由此可见，“突发奇想”其实很可能恰是“深思熟虑”。纵使如此，仍然是只有启迪，没有答案。

周宁教授的“不伦不类”与“突发奇想”，势必导致其学术理路难以追踪。把《人间草木》放在其整体的学术序列中解读，又会呈现何种风景？周云龙的文章做了此种尝试。该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周宁教授的书写转向的隐在意义是什么。氤氲于当下的渐趋僵化的概念式思维，以及雄霸学术生产场的强大经济逻辑，正是《人间草木》的“书写语境”与“理智前提”。周宁教授的治学理路尽管崎岖突转，但始终保持着对于时代的公共议题的高度敏感和介入意识。《人间草木》致力经营的书写离心力的实践意义在周宁教授既往的“为人生的学术”，即戏剧学和跨文化形象学研究中已经浮现，该书的写作意味着对于回应身边的时代思潮的另类方式的尝试，表征着摧毁概念式心智过程中对于澄明理性的重建，以及寻回学术应有的自由与优雅的努力。

周宁教授在《人间草木》中指出，“思想是痛苦的，但思想是唯一的途径”。本刊组织这次圆桌笔谈的真正意图在于向读书界呈示该书所引发的相关问题，引起读者们持续深入地思考，并引导其意义继续向着无限的可能性敞开。